

“双减”政策下延背景下城市幼儿家长教育焦虑的新特征及形成机理研究

■ 陈心彧

摘要:当前,“双减”改革进入向学前教育下延的新阶段。本研究采用“教育—社会—市场”的三元互动视角,对28名城市幼儿家长进行半结构化访谈,对城市幼儿家长教育焦虑的新特征及其形成机理进行分析。实证研究发现:当前城市幼儿家长的教育焦虑呈现出焦虑催化、焦虑产生、焦虑加剧和焦虑缓解四大新特征。上述焦虑的形成机理受到学前教育功能、教育分流体制、社会文化、“影子教育”和社会阶层五个因素影响,涉及教育、社会、市场三大主体。对此,应推动政府、幼儿园、家长 and 全社会形成合力,从而充分发挥教育、社会及市场的协同育人功能。

关键词:“双减”;城市家庭;幼儿家长;教育焦虑;协同育人

【中图分类号】G78 doi:10.3969/j.issn.1674-7178.2023.01.013



开放科学(资源服务)标识码(OSID)

2021年7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拉开了“双减”工作的序幕。如今,“双减”政策在义务教育阶段的学校教育教学质量提升和校外培训治理等工作上取得显著的改革成果,并开始向学前教育阶段延伸。因此,探究“双减”政策下延背景下城市幼儿家长教育焦虑的新特征,对于厘清教育焦虑问题的症结、推动

“双减”政策向学前教育阶段延伸和落地具有重要意义。

一、“双减”政策向学前教育阶段延伸的情况

“双减”政策下延指“双减”政策在义务教育阶段得到普遍实施之后,开始向学前教育阶段延伸的现象。《意见》颁布后,“双减”改革围绕提

【基金项目】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城市中产阶层的教育焦虑:本质、成因及治理——基于广州和深圳等大城市的研究”(编号:GD19CJY10)研究成果。

升学校教育教学质量和治理校外培训等工作出台众多举措,取得了显著的改革成果。当前,“双减”改革进入新阶段,即巩固义务教育改革成果,并向学前教育和高中延伸。

事实上,“双减”政策在颁布之始,就为今后向学前教育阶段延伸留下了政策空间。《意见》指出,“各地在做好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双减’工作的同时,还要统筹做好面向3至6岁学龄前儿童和普通高中学生的校外培训治理工作”,并在学前教育领域提出了规范学前教育培训、推进幼小科学衔接和管控培训广告三个具体举措。

政策引领之下,学前教育领域也发生了一些改变。2021年11月,新东方在线发布公告,将停止经营国内从幼儿园到九年级的培训服务。学科类幼儿培训班开始陆续关停,幼儿园也开展了践行“双减”政策的行动。但是在2022年之前,“双减”工作的重点依然落在义务教育阶段,学前教育阶段的改革并非政策重点和社会关注的焦点。

学前教育阶段是基础教育的开端,也与义务教育阶段直接相连,将对“双减”改革的实施成效产生重要影响。“双减”改革在义务教育阶段取得成效后,下延至学前教育阶段便成为必然。2022年2月,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发布《关于进一步做好教育移动互联网应用程序备案及管理工作的通知(征求意见稿)》,提出“面向学龄前儿童培训的教育移动应用一律停止运行”,标志着“双减”政策向学前教育阶段延伸^[1]。

“双减”政策下延至学前教育阶段,具有以下特点:一是参考前期对义务教育阶段培训的治理经验,规范各类幼儿教育培训机构审批及运行程序,杜绝进行提前教育和课外超前教育的线下学科类培训,禁止各种形式的幼儿线上培训。二是建立合理的幼儿园成本分担机制,进一步发展普惠性学前教育资源,以“普惠园”、

“公办园”为重点,以幼儿园评价制度改革为抓手,不断提高幼儿园园内的保育教育质量。三是继续深入推进幼儿园的“去小学化”,严格落实小学按照课程标准零起点教学,同时加快构建幼儿园和小学双向衔接机制,促进幼小衔接科学化。

二、理论分析框架

基于教育公平理论视角,教育机会公平、教育条件公平和教育结果公平贯穿了整个教育过程^[2-3]。在此过程中,教育的不公平表现为教育资源在不同区域、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不均衡分配。处于弱势地位的家庭会担心子女在教育竞争及未来的社会竞争中的处境,因此可以说教育焦虑与教育公平息息相关,教育焦虑可由教育机会焦虑、教育条件焦虑和教育结果焦虑组成^[4]。

教育社会学在思想上把教育从社会系统中“分离”出来,探讨教育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命题^[5]。因此,传统研究多从教育内部因素和社会外部因素讨论教育问题。进入21世纪,市场机制进入教育领域并重塑了教育的形态^[6]。市场满足了多样化的教育需求,也在一定程度上带来教育内卷、教育焦虑等新问题。“双减”政策指向了教育市场化所带来的结构性矛盾,是公共教育服务供给格局的大调整^[7]。因此,市场已经成为当下分析教育问题的重要因素。

通过进一步分析,可发现教育、社会、市场三个主体涉及学前教育功能、教育分流体制、“影子教育”、社会文化和社会阶层五个影响因素。

学前教育功能包括工具功能和育人功能,其中育人功能是最本质、最主要的功能^[8]。然而,当前学前教育阶段出现的超前教育、过度教

育等问题,反映出幼儿家长过于关心学前教育对帮助幼儿未来在竞争中取得优势的功利作用,其背后是学前教育工具功能的扩大化和极端化。学前教育功能异化背离了教育的本质,因而许多学者认为,教育只有回归育人功能,才能够让教育从根源上回归正轨^[9-10]。

教育分流体制在改革开放以来不断发展,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输送了大量人才。我国的教育分流体制包括重点学校制度和学轨制,这两项制度分别代表了重点与非重点、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的升学路径分流^[11]。不同的升学路径在师资条件、基础设施等各个方面都存在明显差异,学生未来获得的职业和社会经济地位也大有不同,因而出现了优质教育资源分配不均^[12]、职业教育“二流化”^[13]等问题。张凌洋认为,我国教育分流体制已非个性化教育的自主选择,成为了一种淘汰机制^[14],对淘汰的恐惧让家长难以顺其自然。

社会文化既能够作为教育与政治、经济之间的中介被动地作用于教育,也能够主动地按照自身的特点和要求对教育产生独立的影响。具体表现为对教育目标、教育制度、教育方法等客体的影响和对学生、家长、教师等主体的影响,这种影响是深远而持久的。研究表明,“学而优则仕”“望子成龙”“不能输在起跑线上”等

文化观念会导致家长卷入无序的教育竞争,难以保持平衡的心态^[15-16]。当前,社会文化主要通过媒体传播、家长交流、代际传承等方式传递给家长,而网络社交媒体的发展也带来文化传递范围的拓展,导致焦虑情绪的蔓延^[17]。

“影子教育”随着教育市场化的深入而逐渐普及化和制度化^[18]。“影子教育”是一种成本由私人支付的、超出正规教育系统范围的补充式教育。在学前教育阶段,“影子教育”因其个性化和针对性,满足了多元兴趣发展和知识技能获得的双重需求。然而,不同于学校教育的“公共理性”,“影子教育”需要较高的教育投入进行交换^[19],这使家庭经济条件和教育机会获得的关系更加密切。因此,超出承受能力的经济负担和教育投资回报的不确定性导致新的教育焦虑^[20]。

社会阶层以教育为跃升的阶梯和再生产的惯性^[21]。多项研究表明,教育不仅是个人获得文化资源的主流途径,也具有进一步稳定阶层壁垒和促进阶层向上流动的作用^[22-23]。教育在地位获得上的重要性、文化资本的不可直接继承性^[24]使得家长更容易产生阶层跃升的期望。

综上所述,教育、社会和市场三个主体既相互制约又相互配合,通过学前教育功能、教育分流体制、“影子教育”、社会文化和教育机会焦虑、教育条件焦虑、教育结果焦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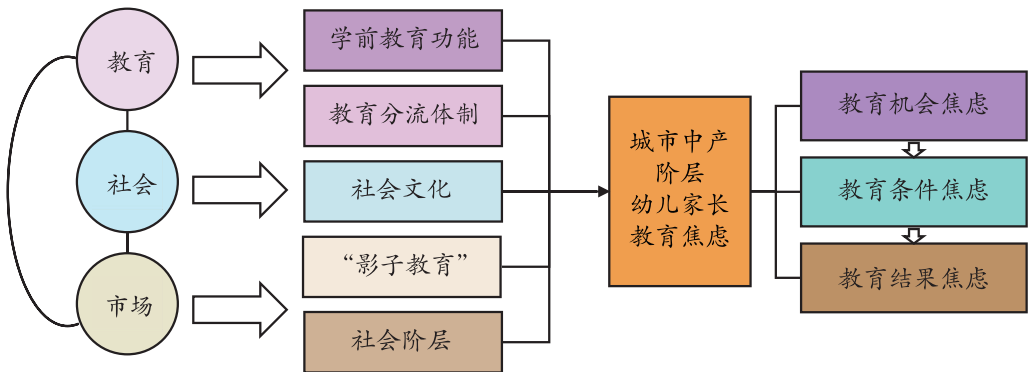


图1 理论分析框架

表1 访谈对象信息表

访谈对象	年龄	职业	教育程度	年收入/万元	城市
M1	33	企业管理者	硕士	35	深圳
M2	36	办事人员	本科	15	深圳
F1	33	专业技术人员	硕士	40	深圳
M3	42	办事人员	硕士	30	深圳
M4	34	商服业人员	本科	7	深圳
M5	31	办事人员	本科	12	深圳
F1	34	专业技术人员	硕士	30	深圳
F2	36	专业技术人员	硕士	38	深圳
F3	39	专业技术人员	本科	20	杭州
M6	32	专业技术人员	硕士	20	杭州
M7	36	办事人员	本科	17	杭州
M8	31	专业技术人员	硕士	20	杭州
F4	35	企业管理者	本科	40	杭州
M9	36	商服业人员	本科	12	杭州
M10	28	办事人员	本科	10	杭州
M11	43	办事人员	硕士	20	杭州
M12	38	办事人员	硕士	15	杭州
F5	35	办事人员	硕士	60	广州
F6	26	专业技术人员	本科	20	广州
M13	36	企业管理者	本科	50	广州
F7	29	企业管理者	本科	30	广州
M14	39	商服业人员	初中	6	广州
F8	30	专业技术人员	本科	15	广州
F9	26	商服业人员	本科	15	广州
M15	24	商服业人员	大专	3	广州
F10	42	个体工商户	本科	50	广州
F11	33	办事人员	本科	20	广州
M16	29	专业技术人员	本科	18	广州

注：字母M代表母亲，F代表父亲，数字代表访谈顺序，如M1代表第一位被访谈母亲。

影响因素之间的冲突与张力对城市幼儿家长教育焦虑产生重要影响。据此，本研究构建了理论分析框架(图1)。

三、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目的抽样与方便抽样结合的方式，于广州、深圳、杭州三市共选取28名访谈对象进行半结构化访谈。访谈对象信息见表1。

半结构化访谈兼具结构性和灵活性，能在保证议题相对集中的同时加深对问题的认识或发现潜在问题^[25]。因此，本研究采用半结构化访谈，通过与城市幼儿家长的深入交谈使其准确而具体地描述对“双减”政策的认识和教育焦虑的变化。基于理论分析框架，访谈主要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从教育机会焦虑、教育条件焦虑和教育结果焦虑三个维度讨论城市幼儿家长教育焦虑的内容和表现；第二部分抓住学前

教育功能、教育分流体制、社会文化、“影子教育”和社会阶层五个影响因素探讨“双减”政策实施后教育焦虑的变化和成因；第三部分探究城市幼儿家长在教育焦虑缓解上所需要的外部支持和自我缓解方法。

访谈基本过程如下：首先，选取部分城市幼儿家长进行预访谈，并根据预访谈结果对访谈提纲进行修订，使访谈提纲更符合城市幼儿家长面临的现实状况并能够更清晰地指向研究内容。之后，通过多种方式联系和筛选受访家长，采用线上语音交流及面对面交流的方式展开正式访谈，对访谈内容进行录音。最后，对访谈录音进行转录并整理成28份访谈文字材料。

本研究也采用了问卷调查法。问卷根据相关研究和理论编制，采用李克特量五级表测量城市幼儿家长教育焦虑程度，并了解“双减”改革后教育焦虑的变化情况。采用线上方式发放问卷，共回收有效问卷146份。

四、城市幼儿家长教育焦虑的四大新特征

调查发现，当前城市幼儿家长总体教育焦虑水平中等偏上($M=2.98, SD=0.93$)，其中，教育结果焦虑($M=3.09, SD=0.98$)和教育条件焦虑($M=3.06, SD=1.00$)更为严重。在教育机会焦虑上，城市幼儿家长会因优质教育资源的入学资格竞争而焦虑，并会采取购买学区房或向他人详细咨询两种方式来抢占优先权。在教育条件焦虑上，城市幼儿家长聚焦师幼比、家园共育等师资问题，并通过主动关注幼儿在园情况以及增强与幼儿园的联系，弥补园方条件缺失。相比之下，教育结果焦虑程度最深，主要是对幼儿当前社会性发展、未来社会地位以及学业就业的焦虑。对此，城市幼儿家长会通过参与培训机构或特殊教育机构等方式缩短幼儿发展差

距。随着“双减”改革逐渐下延，城市幼儿家长的教育焦虑呈现不同的变化态势。问卷调查结果表明，42.5%的受访家长认为“双减”政策实施后教育焦虑更为严重，34.2%的受访家长认为“双减”政策缓解了教育焦虑，其余受访家长认为“双减”政策的下延对其教育焦虑没有影响。进一步分析表明，城市幼儿家长的教育焦虑表现出四大新特征：

(一)焦虑催化：现实阻碍教育责任的回归

“双减”政策对幼儿教育培训的限制指向了幼儿家长用经济投入取代精力投入的教育问题，这体现了国家和社会对幼儿家长教育责任回归的期盼。然而，美好的期盼与城市幼儿家长所面临的现实之间存在矛盾。

第一，双职工家庭缺少时间和精力完全投入幼儿教育，需要包括培训机构在内的托幼机构分担抚育责任。如今，城市家长依然面临平衡家庭和职场的难题。幼儿需要家长的陪伴，家长同样需要实现自己的人生追求，因此，培训班成为分担城市幼儿父母教育压力的选择。在“双减”政策之后，幼儿培训机构的减少带来了教育责任的重新回归，然而城市幼儿家庭中父母无暇照顾幼儿、教育中父亲缺位的困境仍然存在，因而有受访家长认为，“双减”之后“孩子们还没有得到真正的解放，先把家长困死了”。

第二，城市幼儿家长对自己及祖辈的教育能力不认可，渴望专业教师帮助。当所有幼儿都统一接受幼儿园教育时，家庭教育的质量便显得尤为重要。从访谈结果看，大部分城市幼儿家长认同家长应亲自参与幼儿教育，但又表示心有余而力不足。即使是高学历的幼儿家长，仍然因为缺少专业的教育知识和能力而担忧。如今，祖辈参与幼儿教育成为普遍现象，然而，大部分受访家长对祖辈的教育能力存在一定程度的不认同，认为其存在溺爱孩子、教育观

念陈旧等问题。基于以上原因,城市幼儿家长认为教育培训机构更具专业性,在教育条件的弥补和教育结果的达成上能够事半功倍,因而为教育培训机构的减少而焦虑。

(二)焦虑加剧:暗怀对教育公平性的担忧

“双减”政策希望通过治理幼儿教育培训机构、严格要求小学零起点教学等举措,减少家庭背景差距带来的教育差距,缓解教育不公平现象。然而访谈结果表明,“双减”政策在促进教育公平上还需面对新的问题做出持续性改进。

第一,教育培训并未完全杜绝,反而提高了参与培训的经济收入门槛。“双减”政策对平价培训班的限制,倒逼一些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城市幼儿家长转向私人家教等高收费的教育培训。教育培训资源在不同经济地位家庭之间的分配不均衡,实际将加大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教育差距,导致城市幼儿家长对教育不公平的焦虑进一步加深。

第二,幼儿园质量的重要性增加,家长担忧学校教育资源差距的鸿沟难以填补。好的幼儿园意味着在教师水平、硬件设备、同伴影响等各个方面都具有较大优势,然而,进入优质幼儿园往往需要较大的经济投入。“双减”政策实施后,培训班对幼儿园质量差距的平衡作用被限制,幼儿园质量成为应对幼儿之间竞争的更关键因素,教育资源的差距导致家长焦虑的加深。

(三)焦虑产生:难以适应教育环境的转变

校外培训的突然受限打乱了城市幼儿家长原本的教育规划,幼儿园的教学内容和方式也发生了学科性教学减少、游戏化趋向增强的改变,新的教育环境给家长带来挑战。

第一,固化的教育思维和新的教育政策不兼容,城市幼儿家长感到不适应。“双减”政策的实施促使家长开始思考幼儿教育培训在教育中的角色问题,聚焦课堂主阵地、减少课外培训负

担的观念得到了城市幼儿家长的理解。然而,教育方式的转变并非一朝一夕能完成,“双减”政策在短时间内冲击了城市幼儿家长固有的教育思维,使他们面临思想革新的阵痛。

第二,配套服务尚未跟进,需求难以满足带来新的焦虑。随着幼儿园“去小学化”的不断推进,超前学习的行为已经不再被大多数家长认可,但是,教育观念的转变并不等于需求的消失。访谈结果显示,家长在教育条件上的需求从小学知识的学习转向了学科思维的培养,思维训练班成为普遍选择。然而,“双减”政策的实施让培养幼儿学科思维的需求变得难以满足,导致教育结果难以达成,促使新的焦虑在城市幼儿家长之中产生和蔓延。

(四)焦虑缓解:从被迫内卷之中得到解放

深度参与教育内卷并非家长本意,“双减”政策对于校外培训、幼小衔接的要求和治理让城市幼儿家长能跟随本心陪伴幼儿成长,给予了他们从焦虑中脱身的机会。

第一,“双减”政策减少了不必要的培训班,解放了被迫参与内卷的城市幼儿家长。“双减”政策传递了幼儿家长应放平心态、遵循自然规律、静待幼儿成长的教育观念,与这部分城市幼儿家长的心态不谋而合。

第二,小学严格零起点教学缓解了城市幼儿家长对超前学习的焦虑。由于教育获得过程具有累积效应^[26],因此学前教育阶段的表现会影响幼儿后来的发展,小学快速跳过前期知识的现象推动了幼儿园阶段超前学习的盛行。这给幼儿家长带来了额外的苦恼,既希望顺应幼儿发展规律,又担心幼儿无法顺利适应小学学习。“双减”政策要求小学严格按课程标准零起点教学,缓解了城市幼儿家长的焦虑。

五、教育焦虑的形成机理： 教育、社会和市场的三元互动

教育作为社会的子系统,长期以来既受到社会制约,也具备多种社会功能。为回应现代社会中多样化的教育需求,将市场机制引入教育领域成为新世纪教育改革的重要趋势。不同于传统的自由市场机制,教育的市场机制是一种“准市场”制度环境^[27],即市场对教育的介入是有限的,既充分发挥市场的公平竞争机制和自由选择机制,提高教育效率和质量,又以政府的强有力干预保证教育的公益性质。市场的介入改变了教育和社会之间长期和稳定的作用机制,在重塑教育样态的同时也带来了新的结构性矛盾。因此,“双减”政策在化解市场带来的挑战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牵动着教育和社会两个主体。根据理论分析框架,教育焦虑受到教育、社会和市场的综合影响,而教育涉及学前教育功能、教育分流体制、“影子教育”等因素,社会涉及社会文化、社会阶层等因素,市场涉及“影子教育”、社会文化等因素。因此,教育、社会和市场三大主体相互联系,共同推动着前述五大因素对教育焦虑产生作用。

(一)学前教育功能异化从根源上带来对教育短期结果的过度焦虑

教育最直接和最本质的功能就是育人。然而,随着市场化改革不断深入,教育因其成为文化再生产的“筛选”机制,被视为获取优质资源、打破阶层壁垒的重要工具,由此带来了教育工具功能的扩大化与极端化,导致教育焦虑的加剧。第一,当学前教育的工具功能被置于育人功能之上,教育成功标准被窄化为学业上的成功,导致激烈的学业竞争提前至幼儿园阶段,让城市幼儿家长只能将教育的短期目标置于长期发展目标之上。第二,教育工具功

能的放大导致一切教育活动从开始就与教育结果挂钩,教育活动被视为一种投资性行为。教育投资“竹篮打水一场空”的可能和教育期待与结果之间的落差并存,导致城市幼儿家长陷入“焦虑—投资—焦虑”的恶性循环。第三,过度关注学前教育工具功能的背后是功利化的培养目标,这与学前教育顺应幼儿天性的理念是矛盾的,身处矛盾中的城市幼儿家长面临两难选择。教育功能的异化也反映出了教育与社会的关系失衡。教育被片面地视为阶层跃迁的阶梯或社会发展的工具,其在与社会的互动中便处于下乘的地位,那么学生和其家长也不可避免地陷于一种被工具理性奴役和遵循人之天性的矛盾,焦虑的心理亦是矛盾催生的各种问题之一。

“双减”政策同样注意到了教育功能异化的根源性问题,深刻回应了教育应该“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的根本方向问题,并通过监管校外培训、开展学校课后服务等举措,促使家长和社会重新思考教育应有之义,让教育的功能回归正轨。然而,幼儿教育培训的盛行仅仅是教育功能异化的外在表现。当前城市幼儿家长通过教育换取优质生活条件的执念尚未消解,培训需求在“双减”改革之下并未明显缩减。那么,对幼儿教育培训机构限制反而会带来教育供应的“真空”,产生了城市幼儿家长对教育不公平感焦虑加剧、对教育环境转变焦虑等新问题。同时,教育功能异化是社会各个因素交织导致的复杂问题,教育治理是一项系统性的社会公共事务,在政府主导之外,还需要学校、校外培训机构、家庭、社区等多元力量共担责任。然而,当前“双减”政策对于学业负担的治理仍然陷于依赖政府外力推进、其他主体被动参与的困境,因而难以凝聚以“立德树人”为教育根本任务的社会共识。

（二）教育分流体制导致教育资源不平衡和“一考定终身”的现实问题

教育分流体制对城市幼儿家长的影响更多是一种前瞻性的焦虑。在20世纪90年代教育部门明确取消义务教育阶段重点学校之后，重点学校依然“名亡实存”^[28]，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在师资、生源、硬件条件等教育资源上的分配也存在较大差距。由此，地区间、学校间优质教育资源的不平衡引发了激烈的教育资源竞争。同时，当前我国教育分流存在分流标准单一、分流时间固定、转换通道缺失等问题，这些问题共同导致了“一考定终身”现象的出现。对于在此教育分流体制中的城市幼儿家长来说，教育目标变得绝对化，教育竞争呈现出可预见性。由此，原本属于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阶段的家长教育焦虑经由教育分流体制一路下行至幼儿园阶段。教育分流体制对社会流动、市场需求、区域差距等方面产生影响，而其作为一项教育制度，也受到经济、政治和文化的作用^[29]。我们进一步认识到，当前教育分流体制引发教育焦虑的背后同样有社会和市场的踪影。

“双减”政策直接指向教育市场的结构化矛盾，并要求强化“学校教育主阵地作用”。这些举措更多针对教育分流体制的“果”，而教育分流体制本身和它的“因”依然在发挥作用。由于教育资源永远无法完全在每个学生之间均衡分配，市场机制和资本力量也在促使教育制度偏向选择符合市场需要的人，因此教育分流体制在本质上就是一种系统化的社会选择机制。教育结果和教育机会的连锁作用让作为开端的学前教育举足轻重，教育分流结果对未来人生的决定性作用让整个升学路径都难以放松。“双减”政策对于这个复杂的选择机制中某一环节的触动，可能短期内难以见效，甚至带来“孩子

减负，家长增负”的新问题。

（三）社会文化无形而深刻地影响教育焦虑

社会文化会对教育的深层价值取向产生直接的影响。一方面，现代家长已不再对传统文化绝对认同，然而，传统文化已经以一种潜意识的形态根植于家长心中，左右着教育观念和教育选择。如“技进于道”的观念反映了对“技”的偏见和对“道”的推崇，禁锢了城市幼儿家长为子女选择职业教育的可能；又如“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是人们心照不宣的价值评判，推动了家长对学业成绩的过度看重。另一方面，工业化大生产的发展带来了“适应”取向的教育，在此之下的家长和学生为了适应社会要求，往往以社会上流行的行为模式作为自己的行为准则。由此，“虎妈”“鸡娃”等教育现实虽然多是以批判的方式被揭露，但是却展露出一種整体社会都卷入教育竞争的“真相”，反而引起城市幼儿家长无意识的模仿。

“双减”改革对教育的价值观问题提出解决策略，通过意识层面的文化传递淡化城市幼儿家长的教育焦虑。但是，非意识层面上的社会文化已经在城市幼儿家长心中形成了深刻而稳定的结构，并非以强有力的行政手段可轻易改变。这也印证了许多教育社会学家的观点，即在我国社会改革进程之中，许多社会改革的问题（包括教育改革）都尖锐地表现为一种文化问题^[30]。文化相对于政策存在独立性和偏离性，因此，“双减”政策难以让城市幼儿家长“内化于心并外化于行”。一方面，“双减”改革背后的教育理念与功利性、竞争性的文化心理存在相悖之处，因而难以被城市幼儿家长真正内化。另一方面，文化观念的拨乱反正并非一朝一夕之功，因而教育焦虑情绪的淡化也难有立竿见影的效果。

（四）“影子教育”兼具教育焦虑催化剂和心

理安慰剂的双重作用

作为教育市场化的重要表现,“影子教育”对城市幼儿家长具有双重性的影响。从整体上看,“影子教育”是城市幼儿家长教育焦虑的重要催化剂。当社会上有人参与“影子教育”,其他人为了不处于劣势,只能也对“影子教育”进行密集的投入。但是,此时整个城市幼儿群体的竞争实力也在水涨船高,城市对优秀人才的聚集效应不断增强,而优质教育资源的总量并未增加。因此,当越来越多人通过“影子教育”取得优势,最终将达到新的平衡。与一开始相比,提高的并非教育竞争优势,而仅仅是学业负担和教育焦虑。因此,从整体上看,市场的逐利性让“影子教育”借由偏离本质的教育和工业社会的竞争文化迅速成长,并改变了原本的教育模式和社会环境。然而,对于每一个家长个体来说,“影子教育”在某种程度上是缓解城市幼儿家长教育焦虑的心理安慰剂。访谈发现,在进行教育选择时,城市幼儿家长多以“理性经济人”的立场做出个人的最佳选择而非团队的最佳选择,即因为害怕其他家长“抢跑”,而不得不选择通过“影子教育”实现进入优质小学、快速适应小学学习的目标。由此可见,城市幼儿家长对“影子教育”的需求更多源于理性选择下的无奈。

纵观全局,“双减”改革全面规范了校外教育培训机构,能够有效限制“影子教育”在加剧不必要的教育竞争上的消极影响,以扭转市场对教育和社会的破坏作用。然而,“双减”改革也打破了家长和教育培训机构之间稳定的供需关系,“影子教育”资源由全面过剩转向短期不足,引发了城市幼儿家长对“影子教育”资源的争抢。同时,对“影子教育”的不彻底限制也反过来提高了普通家庭参与教育竞争的门槛,加剧了教育不公平感。因此可以说,“双减”政策

对于“影子教育”的治理导致教育焦虑理论上的整体缓解和现实中的个体增长。当然从长期来看,这种个体的焦虑增长会逐渐缓解。

(五)社会阶层代际传递的期望和向下流动的风险影响教育焦虑

教育不仅是实现社会阶层流动的重要机制,也是社会阶层结构再生产的工具。访谈发现,社会阶层会通过不同的途径影响城市幼儿家长的教育焦虑。第一,教育是实现社会阶层流动的重要途径,自身教育经历让部分城市幼儿家长相信“一旦在教育竞争中失败,就很难再成为社会竞争中的成功者”,从而使教育成为家长的关注点和焦虑源。第二,城市幼儿家长既有对社会阶层向下流动的焦虑,也有对自身社会阶层的自信。一方面,城市幼儿家长为子女未来的教育程度和社会阶层划定了底线,这一底线多以父母自身情况为准。另一方面,处于中等或较高社会阶层的城市幼儿家长,对自己的社会阶层在子女教育上发挥的作用怀有自信。但是,当前子女所处的教育环境和城市幼儿家长经验中的参照环境并不相同。现实和经验的矛盾加剧了城市幼儿家长的自我怀疑,在怀疑中产生了对底线目标无法达成的恐惧。

由上述分析可知,家长作为一个社会角色,对后代所处社会阶层的期望是其教育焦虑的直接来源。这份期望越强烈,作为教育必经上升通路的教育分流体制、作为潜在选择范本的社会文化、作为优质资源补偿手段的“影子教育”将发挥更为重要的影响。从这个角度看,社会流动比教育或市场中的因素更显著地影响家长教育焦虑。“双减”政策带来了平价教育培训机构的减少和学校教育质量重要性的提升,也随之引发了家庭资本在决定教育机会获得上权重加大的问题,因而让城市幼儿家长加剧了对教育不公平感的焦虑。

六、缓解城市幼儿家长教育焦虑的因应策略

由新特征及形成机制的分析可见,“双减”政策下延背景下城市幼儿家长教育焦虑的新特征受到学前教育功能、教育分流体制、社会文化、“影子教育”和社会阶层五个因素影响,涉及教育、社会、市场三大主体。对此,应实现幼儿园、教育部门、幼儿教育培训机构等各社会主体的同频共振,充分发挥教育、社会及市场的协同育人功能。

(一)有效推动“双减”改革向学前教育延伸

1.加强学前阶段的“双减”治理

当前,“双减”政策在幼儿教育培训机构治理上的力度尚待加强,巧立名目上课、私下隐蔽开班等乱象使城市幼儿家长教育焦虑不降反增。教育部门应参考义务教育培训治理的经验,针对幼儿教育机构发展的现实情况,进一步细化“双减”政策目标和落实细则,协同各市场主体、行业协会、媒体及社会力量等多方共同建立幼儿教育培训治理常态化机制。同时,目前“双减”改革在政策工具选择上以命令性工具为主,因而带有理想取向^[31]。为此,在“双减”政策向学前教育阶段下延的新阶段,应采用多样化的政策工具,以激励型工具提升幼儿教育培训机构和家长“双减”的主动性,推动各个教育主体达成共识、形成合力,促使“双减”改革更有效地回应城市幼儿家长教育焦虑的现实问题。

2.充分激发幼儿教育培训的专业优势

对幼儿教育培训机构的治理并非排斥学前教育中的市场化因素,而是应充分利用市场化优势,满足城市幼儿家长多样化的教育需求,使幼儿教育培训成为幼儿园教育的重要补充力量。为此,教育部门应推动幼儿教育培训机构实现商业化到公益性的转型,鼓励幼儿教育培

训机构与幼儿园合作,降低优质课外教育资源获取的经济门槛,减少城市幼儿家长在幼儿个性化培养上的经济负担,促进学前教育公共性的回归。另外,在“双减”政策下延的趋势下,幼儿培训机构应与时俱进,积极推进商业模式和运营方式的改革与创新,总结前期经验并发挥专业优势,成为先进教育模式的试验者。让幼儿教育培训机构成为释放幼儿质朴天性、激活幼儿内在发展潜力的沃土,实现从“贩卖教育焦虑”到“赋能未来教育”的转变。

(二)推进教育共识正本清源、破旧立新

1.在全社会达成儿童本位的教育共识

随着“双减”政策下延至学前教育阶段,幼儿这一主体逐渐进入改革中心。学前教育能否回归儿童本位,不仅源于充分舒展幼儿天性、培养幼儿积极生命情态的目标要求,也关系到城市幼儿家长是否能保持平和的教育心态,静待幼儿成长。事实上,当前无论是教育部门还是幼儿家长,都尚未实现完全的儿童本位,机械化和功利化的倾向仍然在整个社会中存在。因此,在“双减”向下一个新阶段迈进之时,全社会都应该借改革契机转变教育观念,以一致的改革目标和创造性的改革举措为幼儿提供更加自由、自然、充满乐趣的成长环境。

2.在全社会树立多样化的人才观

教育功能的功利化在教育的过程中均有体现,城市幼儿家长受到义务教育阶段教育评价标准单一、升学通道狭窄等现实的困扰,因而难以消除教育焦虑。全社会要认识到教育的目的是育人而非制器。一方面,应摒弃“唯分数”“唯升学”的畸形观念,加强对社会舆论的监管,重塑社会舆论环境;另一方面,应加强教育政策宣传,积极建立“人尽其才”的新文化,传播顺应发展规律的科学理念,引导社会教育风气向积极健康方向发展。

(三)构建学前教育服务多元供给模式

1.以教育场馆建设扩展学前教育场域

随着公共教育资源开发的深入,如今博物馆、美术馆、体育馆等公共场馆已经超越传统的意义,融入了多元而综合的教育价值。教育场馆潜藏着丰富的科学、艺术、历史等社会文化底蕴,能够给幼儿带来更广阔、更开放的教育。对此,一是要通过扩展教育场馆空间、整合教育场馆功能、共享教育场馆资源等方式,最大限度地挖掘具有教育价值的公共资源,让学前教育的场域突破幼儿园、培训班、家庭的局限,充盈在社会的每个角落。二是要依据幼儿的发展规律和发展需要重新整合场馆资源。教育场馆可以和幼儿园、高校等学前教育专业机构达成深度合作,共同设计浸润童心的教育场馆外观,协同开发作为幼儿园课程延伸的场馆课程。

2.以特色课程开发延展幼儿园服务供给

城市幼儿家长对培训机构的依赖反映出对当前幼儿园教育在促进幼儿个性化发展、做好幼小衔接上的误解和不信任,而事实上,幼儿园更具有专业性和权威性。因此,幼儿园应通过特色课程的开发、教学质量的提升,重新成为幼儿教育的主阵地。首先,幼儿园之间可以建立结对帮扶机制,通过讲座培训、经验分享、教学研讨等方式实现教学资源的互通互享,对教育质量薄弱的幼儿园进行“输血式”帮助,有效缩小幼儿园之间的差距,淡化城市幼儿家长对幼儿园质量差距的担忧。其次,幼儿园要落实“一园一长”,结合幼儿发展实际情况和本土文化开发自己的特色课程。最后,与地方院校合作教研,改善“去小学化”过程中出现的“幼儿园和小学割裂”“应教未教”“形式大于内容”等问题,注重幼儿注意力、创新力、良好的学习与行为习惯的培养,做好幼儿园与小学在课程内容体系结构上的衔接,让幼儿做好小学入学准备。

(四)以教育制度改革带动“双减”政策延伸

1.改革教育分流体制及相关配套制度

教育分流体制改革可以减少家长的后顾之忧。首先,应突破单一的教育分流标准,推进教育评价实现从“分数本位”到“素养本位”的深刻转型。其次,应改变在义务教育阶段结束时强迫分流的制度,避免过早的教育分流导致教育焦虑提前和加剧社会阶层固化。最后,应加强教育分流体制的可选择性,破除重学术轻技术的倾向,给予学生依据兴趣和专长选择路径的机会,变独木桥为立交桥。

2.充足和均衡优质教育资源

重点学校制度在客观上带来了优质教育资源不充足、不均衡的现实,导致不同性质、不同类别的教育之间差距加大,使城市幼儿家长陷入对当前及未来激烈教育竞争的焦虑中。为此,首先,政府可以通过集团化办学、改建扩建学校等方式,扩充优质学校的队伍,缩小不同学校之间的差距。其次,针对学前教育底子薄、欠债多的问题,通过学前教育财政体制改革,加大地方政府对学前教育成本的整体分担力度,从根本上缓解学前教育供需矛盾。最后,聚焦普职分流困境,以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为契机,通过提升办学条件、畅通升学通道、优化办学定位,形成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协调发展、齐头并进的良好局面。

参考文献:

- [1] 陈磊:《学龄前教育在线化趋势该严控了——北京拟叫停面向学龄前儿童培训教育移动应用 专家解读》[N],《法治日报》2022年3月1日第4版。
- [2] 吴遵民:《基础教育公平论:中国基础教育公平与均衡发展的政策研究》[M],上海教育出版社,2014年,第85页。
- [3] 刘复兴:《我国教育政策的公平性与公平机制》[J],

《教育研究》2002年第10期,第45-50页。

[4] 余雅风、姚真:《“双减”背景下家长的教育焦虑及消解路径》[J],《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4期,第39-49页

[5] 吴康宁:《教育社会学》[M],人民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52页。

[6] 余晖:《“双减”时代基础教育的公共性回归与公平性隐忧》[J],《南京社会科学》2021年第12期,第145-153页。

[7] 张志勇:《“双减”格局下公共教育体系的重构与治理》[J],《中国教育学刊》2021年第9期,第20-26页。

[8] 张云霞:《教育功能的社会学研究》[M],武汉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65页。

[9] 谭春芳、姜文:《中国教育政策重心的嬗变》[J],《现代教育管理》2012年第2期,第60-64页。

[10] 许平友:《现代教育功能的异化及其回归》[J],《中学政治教学参考》2016年第3期,第69-70页。

[11] 吴愈晓:《教育分流体制与中国的教育分层(1978—2008)》[J],《社会学研究》2013年第4期,第179-202页。

[12] 刘精明:《教育选择方式及其后果》[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4年第1期,第64-71页。

[13] 和震:《论职业教育的全民性》[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08年第33期,第1页。

[14] 张凌洋:《我国教育分流制度问题及对策》[J],《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14年第6期,第55-58页。

[15] 崔允漷、张紫红:《后“双减”时代何以防止义务教育加剧内卷化》[J],《上海教育科研》2022年第2期,第5-8页。

[16] 司晓宏、王桐:《“双减”之下:教育焦虑现象的纾解与治理》[J],《中小学管理》2021年第10期,第39-41页。

[17] 段雨、孙艺宁:《“双减”政策落实背景下基础教育领域内卷化的破解策略》[J],《成都师范学院学报》2022年第3期,第8-15页。

[18] 薛海平、左舒艺:《我国基础教育学生参加课外补习的现状与变化趋势》[J],《教育科学研究》2021年第1期,第16-25页。

[19] 蔡文伯、甘雪岩:《家庭影子教育投资行为的支出负担与群体差异》[J],《教育评论》2021年第6期,第79-

84页。

[20] 张俊友:《基础教育的“准市场化”变革及矫正》[J],《教育理论与实践》2021年第28期,第30-34页。

[21] 张学敏、周杰:《新时代教育突破社会阶层再生产问题研究》[J],《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3期,第146-156页。

[22] 田丰、静永超:《工之子恒为工?——中国城市社会流动与家庭教养方式的阶层分化》[J],《社会学研究》2021年第6期,第83-101页。

[23] 孙东:《学前教育机会公平的实证研究——基于南京市学前教育审计调查》[J],《上海教育科研》2013年第2期,第10-13页。

[24] 皮埃尔·布尔迪厄、J.C. 帕斯隆:《再生产——一种教育系统理论的要点》[M],邢克超译,商务印书馆,2021年,第85页。

[25] 陈向明:《质的研究方法与社会科学研究 2016 版》[M],教育科学出版社,2016年,第171页。

[26] 褚宏启:《新时代需要什么样的教育公平:研究问题域与政策工具箱》[J],《教育研究》2020年第2期,第4-16页。

[27] 刘复兴:《教育民营化与教育的准市场制度》[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5期,第12-21页。

[28] 刘远碧:《我国义务教育阶段重点学校制度的历史回顾及思考》[J],《河南教育(基教版)》2009年第1期,第4-5页。

[29] 鲁洁主编:《教育社会学》[M],人民教育出版社,1990年,第131页。

[30] 同[29],第130页。

[31] 黄伟:《理想目标与现实问题:公共政策工具选择的基本取向》[J],《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10年第11期,第30-34页。

作者简介:陈心彧,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硕士研究生、华南师范大学广州教育治理现代化高等研究中心研究助理。

责任编辑:卢小文